

梵净山特色佛教文化建设研究

黄尚文

(铜仁学院政史系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通过对湖南常德诗墙和台湾佛光山等成功案例的分析,提出在建设梵净山佛教文化时,应当注意形成梵净山特色的弥勒净土信仰和法相唯识学研究。

关键词:梵净山;佛教文化;文化建设;法相唯识学

中图分类号:G 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314-(2009)03-0074-07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Culture with Fanjingshan Characteristics

HUANG Shang-wen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which took Poetry Wall of Changde Hunan and Fo Guang Shan in Taiwan as successful cases,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Pure Land of Maitreya characteristics Fanjingshan beliefs and Consciousness-only study of law when we construct Buddhist culture of Fanjingshan.

Key words: Fanjingshan; Buddh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of Law

关于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史实层面的分析,已经有很多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只有对梵净山佛教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研究,才能确立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地位。

1 梵净山佛教文化之不足

1.1 梵净山佛教文化历史底蕴之欠缺

据王路平先生的《贵州佛教史》一书中所说:“梵净山佛教兴自明初,在明代以前,梵净山乃一荒山野岭。”其证据有:清代印江举人田宗润在《诗会集韵》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此山(指梵净山——笔者加)开自明,迄今历年已久。明前此山荒烟蔓草,车马不通,缘其中密菁深林,豺狼当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梵净山佛教的历史,确应从明代开始计算。

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的“佛缘”,开始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68年,五台山建成了第一座寺庙——显通寺(原名大孚灵鹫寺)。而五台山被

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实始于唐代,唐太宗曾经说过:“五台山者,文殊闍室,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祇畏。”(《山西通志卷》)而后随着唐代无远弗届的国威和文化传播,五台山也就成为了教内外闻名的文殊菩萨的道场。

位于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则有“海天佛国”的美誉。据说在五代年间,有个叫慧锷的和尚,请一尊观音像到日本去,在普陀山遇到风暴,于是就停下来暂避风浪,风停雨息之后,想继续前行,但却怎么也无法移动观音像了,大家认为是观音菩萨希望留在普陀,于是就在普陀山上建“不肯去观音院”,供奉观音。到了宋神宗,下诏正式建寺,从而形成了普济、法雨和慧济三大寺并立的格局。被公认为是观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

地藏菩萨是释迦示寂到弥勒降生之前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赖以救苦的大菩萨,释迦牟尼佛在《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里,再三叮嘱地藏菩萨:“汝

收稿日期:2009-03-08

作者简介:黄尚文(1981—),男,湖南益阳人,哲学硕士,铜仁学院政史系讲师。

当忆念吾在忉利天宫殷勤付嘱,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已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遇佛授记。”而九华山之所以被认为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则是因为唐代新罗僧王子金乔觉,他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来到中国游学,最终辗转来到九华山卓锡,居此数十年,未曾归国。示寂三年之后,开函视之,面貌如生,因其笃信地藏,被人认为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而九华山,也就被公认为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普贤菩萨在佛教里表“大行”,随着净土宗在中国的流行,《普贤行愿品》被认为是净土五经之一而得到非常的重视,而普贤菩萨也得到广泛地认同。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慧持和尚从庐山入蜀,在此修建普贤寺,供奉普贤菩萨,传峨眉山成为普贤菩萨道场,即由此而来。

上述的佛教四大名山,其佛教的兴起以及被认定是四大菩萨的道场,其历史及渊源都十分深远,梵净山佛教之兴起,历史较为短暂。

1.2 梵净山弥勒道场证据之不足

梵净山之被认为是弥勒菩萨的道场,据王路平先生通过研究明户部侍郎李之彦撰写的《敕赐重修梵净山金顶序碑》得出的结论,认为:“由碑文可知,明万历年间,梵净山已成为海内佛教名山,梵净山之弥勒道场亦在其时。”但查对原文,并没有这样直接的定论,王路平先生的证据,当在于一个神话传说,而这个传说,也并没有说梵净山就是弥勒菩萨的道场。

据《敕赐重修梵净山金顶序碑》中记载:“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刀劈破红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在这里不过是有人传说弥勒、释迦分管世界,用金刀将一山分为二山而已,并没有说梵净山就是弥勒菩萨的道场。

而且,这个传说与教义殊为不合,不能作为梵净山就是弥勒菩萨的道场的证据。据《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中记载:“阎浮提岁数五十六亿万岁,尔乃下生于阎浮提,如弥勒下生经说。”虽然弥勒菩萨下生的时间说法不一,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并不是与释迦牟尼同时的佛,并且他也不是过去

佛,而是未来佛,据佛经记载,弥勒菩萨得佛授记,现在还在兜率天宫内院说法,等待下生,因此弥勒也被称为“当来下生弥勒佛”。既然弥勒佛和释迦佛是在时间上一前一后的两位佛,而并不是同时代的佛,那么这个传说就无法与基本教义统一起来,不能作为一个证据说服教内的信众认可梵净山作为弥勒菩萨的道场。

其次,《敕赐重修梵净山金顶序碑》中的确写道:“有古佛道场名梵净山者,则又为天下众名岳之宗也。”但“古佛”并不是指弥勒菩萨,理由如前所述。此证若提出来,反倒是对梵净山弥勒道场说不利的一个证据。

就寺庙平常供奉的诸佛菩萨而言,梵净山佛教在历史上也并没有突出弥勒信仰。如清末光绪年间举人唐仁沛撰写的《重修朝阳寺碑》中记载:“有僧心常者,……且外修墙垣,内装佛座,若释迦如来、观音大士及十八罗汉、廿四诸天、韦陀尊者等像。”在梵净山佛教寺庙中供奉的,也就是一般寺庙所供奉的诸佛菩萨,并没有突出弥勒菩萨的在梵净山的特殊的地位。这与四大名山突出相应菩萨加以信奉相比,实为梵净山弥勒道场说之不足。

至于王路平先生在该书第七章“贵州佛教的特征”中所说的对弥勒的崇拜,也只有简单的陈述,并没有详细的论证。他说:“黔东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出现并兴隆便是典型的一例。除此之外,贵州境内的大小寺庙,亦普遍建有弥勒殿供奉弥勒(因殿东西两侧分列四大天王,故也称天王殿)。”第一如前所述,梵净山是否为弥勒道场,在当时直到现在都还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第二寺庙进门就是天王殿,供奉弥勒佛,这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普遍的现象,并不是贵州所独有,如果因为这个就认为弥勒崇拜为贵州佛教的特征,那毋宁说弥勒崇拜可为中国汉传佛教之特征。

就梵净山佛教宗派本身而言,王路平先生在《贵州佛教史》中通过对梵净山佛教法统的研究,认为“梵净山佛教宗派系禅宗……至明季梵净山禅宗始传破山临济一系。”但据佛教历史,弥勒菩萨于

佛入灭九百年后,出现于印度,为大乘法相唯识学的始祖,有《瑜伽师地论》等著作。法相唯识宗和禅宗虽同为佛教宗派,但是在教理上却大有不同,法相唯识学乃大乘相宗,禅宗乃大乘性宗。既然梵净山为弥勒菩萨的道场,就应当在宣扬弥勒菩萨的学说上有所侧重,但历史并非如此。

除此之外,王路平先生还认为贵州佛教有“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特点,而他在论及梵净山脚庵(庙)的时候,也说它们“多为释道儒巫混合”,并认为这也“反映了梵净山佛教的特征。”而在“2004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上,宋立道博士认为:梵净山佛教世俗的东西较多,今后要努力使之成为正统佛教。学诚法师认为:梵净山佛教的历史,是一个从正统佛教到民间佛教,再到正统佛教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梵净山佛教文化历史中,弥勒信仰并不突出。

综上所述,若欲认定梵净山为弥勒菩萨道场,在历史层面上,似无确信的证据。

1.3 梵净山弥勒道场地位之挑战

就现实而言,除了梵净山认为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外,尚有浙江奉化、云南鸡足山亦认为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因此,梵净山弥勒道场之地位,并不是无可动摇的,而且,其他两个地方似乎有比梵净山更多的历史证据来证明它们才是弥勒菩萨的道场。

2008年11月7日浙江奉化举行了“2008中国(奉化)雪窦山弥勒文化节”,据称:“本届弥勒文化节成功举办了弥勒文化节开幕式、海峡两岸弥勒文化研讨会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及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奉化深厚的弥勒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弥勒文化氛围。同时,通过奉化旅游推介会、中国佛教名山旅游合作签约仪式的成功举办,不仅全面推介了奉化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而且与上海、江苏等地的旅行社,以及上海、杭州等地的旅游集散中心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与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等四大佛教名山管委会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签署并宣读了《中国佛教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雪窦山宣言》。”

奉化岳林寺、雪窦山之所以能称是弥勒菩萨的道场,乃是因为公认的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是奉化人,在奉化出家、修行、度众、圆寂。我国汉传佛教弥勒菩萨的造型,也正是依照布袋和尚的外形塑造的。而且,北宋初年(988年)赞宁所著《宋高僧传》卷21中就有对布袋和尚的传记,而后的禅宗典籍《景德传灯录》中也有对布袋和尚更详细的记载,因此,奉化布袋弥勒在佛教史上的地位,自是无可动摇的。

而在现代佛教史上,“1932年,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出任雪窦寺方丈,首次提议把雪窦山列入五大名山。1934年出版的佛学辞典曾记载:有人提议于佛教四大名山外,加雪窦山为五大名山。1987年重修雪窦寺期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莅临视察,赞同此说,并建议重建中的雪窦寺,增加一座其他寺院没有的佛殿“弥勒宝殿”,以凸显五大名山的特色。”

由是观之,奉化之为弥勒道场,不论在历史还是在现代、教内还是教外,都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重要人士的支持,这是梵净山弥勒道场定位所欠缺的。

其次是云南鸡足山,鸡足山之为弥勒道场,也有着它殊胜的地位。据《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等经典记载,迦叶尊者受佛所托,在耆闍崛山入定待弥勒佛下生,到时会将释迦牟尼佛留下的袈裟转交给弥勒菩萨,并帮助弥勒菩萨度化众生。如《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说:“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大迦叶!亦不应般涅槃,要待弥勒出现世间。’”又如《佛说弥勒成佛经》中记载:“摩诃迦叶即从灭尽定觉,齐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长跪合掌,持释迦牟尼佛僧迦梨,授与弥勒而作是言:‘大师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伽罗河三藐三佛陀,临涅槃时以此法衣咐嘱于我,令奉世尊。’”汉传佛教则认为迦叶尊者就在云南鸡足山入定。而近代高僧虚云长老也曾在鸡足山修建寺庙度化众生,在他的年谱里记载,他在112岁的时候也曾上升到兜率天内院听弥勒菩萨说法。云南鸡足山的地位,似乎也确

立得十分牢固。

梵净山的佛教文化虽然也相当的鼎盛,但是比较而言,梵净山佛教文化不论其历史渊源、教内外的影响、民间普通大众心中的认知各方面,其欲为五大名山之弥勒道场,还有很多不足和欠缺之处。

2 问题解决之方向及现实依据

2.1 问题解决之方向

经过第一节的论述,梵净山欲为佛教第五大名山、弥勒菩萨之道场,历史上的证据不足,而现实中又存在有力对手的挑战,乍一看来,让人顿生无望之感,但我们不必灰心,在历史上我们纵有不足之处,但文化之为文化乃是人所创造的,这正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坦然承认,梵净山佛教文化,在历史上与其他四大名山,在文化积淀上,不能与之相比。如果我们只从挖掘历史底蕴着手,再怎么也不能取得与它们对等的地位,至多像现在很多旅游景点那样,编造出一些粗俗的所谓民俗传说故事,梵净山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在民众、尤其是佛教信众心目中,将永无出头之日。因此,挖掘历史文化固然要做,但只是挖掘,那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下定决心:要建设梵净山佛教文化而不只是挖掘梵净山佛教文化。“建设”代表的是一种创造和寄希望于未来,这是更加广阔、更可以作为的舞台,“挖掘”意味着只能在过去中打转,只能仰前人之鼻息。其中的差别,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题为《梵净山特色佛教文化建设研究》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可以建设梵净山佛教文化?那是因为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如据佛经记载:迦叶尊者本来是在摩竭国界毗提村耆闍崛山中入定,但现在我们都认为他是在云南鸡足山;观世音菩萨在印度和藏传佛教中都是男身,但在汉传佛教中却多是女身,等等。因此,既然文化都是人创造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创造梵净山特色的佛教文化;虽然梵净山佛教文化在历史上有不足,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建设加以弥补。

2.2 现实依据

在本小节中,我将通过对几个例证的分析来证明文化是可以创造的。

例证一,常德诗墙。

湖南常德与铜仁的历史渊源不可谓不深,于沅江顺流而下,就可以直达常德。常德位于湘西北,在沅江之畔,为防沅江洪水泛滥,常德在沅江北岸城区修建了一座防洪大堤。一座防洪大堤实在是再平淡不过了,但是富有想象力的常德人采纳了当时常德政协委员伍顺生提交的修建常德诗墙的议案,在全长近6华里的防洪大堤上刻上与常德有关的诗词和中外名篇。历经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修建,于2000年9月竣工,旋即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世界记录的颁发的“世界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称号。

现常德诗墙官方网站上介绍道:“诗墙全长6华里,临江而立,楼台点缀,气势恢宏。分《百代沧桑》、《名贤题咏》、《武陵佳致》、《兰芷风华》、《华夏新声》、《五洲撷英》六大篇章,选刻自先秦以来有关常德的诗作和中外名诗1267首。诗词用书法形式表现,由全国包括港澳台在内的948名书法家书写,真、行、草、隶、篆集于一墙,精彩纷呈。其间刻嵌43幅精美的中外石壁画。各大篇章墙名和篇名,分别由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沈鹏、启功、颜家龙、孙其峰、王学仲和萧娴、张仃、臧克家、方毅、陈天然等题写。曹禺、舒同、吴作人生前也分别作了“武陵风流”、“江山如画”、“风景这边独好”的题签。”

常德诗墙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肯定:除获得基尼斯世界记录外,2002年4月获得“全国诗教先进单位”称号;2003年3月建设部在全国第二次最佳人居环境奖评选中,诗墙和诗墙公园被评为最佳人居环境范例奖,实现了湖南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2000年3月和4月,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国诗人(新诗)分别组成考察团赴常德实地考察,都赞誉“诗墙堪称‘环球第一墙’!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极具创造性的伟大工程,开创了当代文化建设特别是碑林文

化建设的先河”；诗墙还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重要媒体的关注，纷纷载文报道；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乔石、朱基、曾庆红等都曾经参观考察过诗墙，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评价道：“常德诗墙是一大创举”；海基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也曾经参观游览，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而在普通游客心中，常德诗墙几成为常德的一张城市旅游名片，凡去常德旅游者，无不去诗墙参观。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常德历史人文鼎盛，诗墙不过一近世人造景观，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这么高的肯定和赞誉呢？

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是可以建设的！

例证二，台湾佛光山。

佛光山位于台湾省高雄县大树乡，原为一野草遍地、荆棘丛生之荒岭，行人绝迹。1967年星云大师开始在此建立寺院，1975年4月完成初期工程，现为台湾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台湾最大的佛教圣地，有“南台佛都”之称。

台湾佛教四大名山都有各自的特色，佛光山主要侧重于文教。文化方面，佛光山有多种文化传播机构，如人间通讯社、人间卫视、佛光缘美术馆、普门学报、美国佛光出版社、佛光山人文教基金会等。乃至由于佛光山及星云大师的著作日多，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为“佛光山”和“星云大师”作品，在《国会图书分类法》之佛教分类号之下，设立单独的分类号BQ9800.F63，并进入到大专院校及其他各类图书馆编号系统中。可见其影响之大。

教育方面，佛光山在全球“共创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且从一九九一年起，陆续在美国、台湾、澳洲创办四所大学（一所筹备中），目前在台湾各地有八所社区大学，在世界五大洲有近五十所中华学校”。

宗教建设方面，除创建佛光寺外，在全球建立了两百多个道场，1991年创建国际佛光会，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地区有一百多个分协会，等等。

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带领下，五十年间由一荒山野岭竟成世界佛教一重要宗派，在台湾乃至世界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很多的创举被大陆等地

的汉传佛教机构所采用，如佛学夏令营、短期出家等等，成为践行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重要力量。何谓文化不可以建设？

梵净山称是弥勒菩萨的道场，与佛光山同属佛教，而佛光山原来荒山一座，经过五十年的建设，就有如此成就，我们又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更何况梵净山已有相当的佛教历史文化底蕴！

从本节中，通过常德诗墙和台湾佛光山的实例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梵净山佛教文化历史底蕴不够深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找到并坚持正确的方向：建设而非挖掘，经十余年二十余年，必有斐然的成就。

3 具体的措施及理论依据

3.1 成功经验的理论依据

常德诗墙和佛光山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当然有诸多原因，单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们成功的共同之处在于：能够融入一定的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它们能和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结合起来并给与适合时代和地域的新的形式。如常德诗墙，诗墙中的内容绝大多数都不是新的，但利用防洪大堤，镌刻出一道诗墙，这就是有特色的文化，成了一道标志；而台湾佛光山，则单凭人力，在荒山之上，创建一个全新的佛教宗派，影响遍及全球。

我们可以借用解释学的理论来分析二者的成功之道。解释学是研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的科学，理解是指通过对历史流传物的参与而获得历史流传物表达出来的真理。但“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这个前理解就是我们的理解的前提，由于这种前理解的存在，就为理解者提供了一定的“视域”，“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加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这样，理解就产生了，对于任何处于一定前理解的人来说，如果他想扩大他的世界经验，这样的理解都是他所必须去追寻的。

运用上述理论来分析两个事例:常德诗墙之所以被得到这样高的认可和肯定,不仅是官方的,还包括普通大众的,乃是因为诗墙构成了一个历史流传物,或者说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是在我们的“前理解”——我们拥有的文化传统意识——之中,这个前理解也就是我们已有的“视域”。当我们参与到欣赏诗墙的“游戏”中,我们的视域就通过诗墙这个文本达到对更广阔的视域(文化传统)的融合,这样,理解就产生了,这样的理解,乃是人的世界经验的源泉,也是人与世界的根本关系显现方式。这样的理解,乃是处于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任何人都希望获得的。诗墙为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流传物,成就了人与世界的理解;诗墙同时也得到了肯定。

而佛光山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也是因为她们创造了一个历史流传物,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在我们的前理解中,我们通过对这个历史流传物的参与能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视域融合,这样的视域融合,带给我们一种新的世界经验,这也是处于一定文化传统的人都追求的。

因此,我们若要建设成功的梵净山佛教文化,就必须遵从二者的成功经验:创造一个在大众视域中的历史流传物、一个文本,通过它,能和大众产生视域融合,使大众能扩大他们的世界经验。这样才能吸引他们,我们自己也才能获得成功。

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历史流传物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佛教文化、弥勒道场,通过它们,梵净山就能达到与大众的视域融合。因为梵净山能给大众提供新的世界经验的机会,在带给大众这样的机会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成功的机会。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对它们的建设,也就是说,创造出这样一个真正的历史流传物,使它由思想变为现实。

3.2 具体的措施

既然我们把梵净山定位为“梵天净土”,那当然要突出佛教文化的建设,这样的佛教文化建设,并不是有了寺庙、有了最大的弥勒金佛就够了的,君不见海南三亚海上观音为世上最高的观音,但没有人会因此就认为海南三亚是观音菩萨的道场。

梵净山既然是弥勒菩萨的道场,而弥勒菩萨为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那么我们在佛教文化建设上就应该突出法相唯识学的建设。这个就包括文化上和寺庙上两个方面。

中国法相唯识宗自玄奘法师创立,虽风行一时,法相一学,向称难治,自唐末即中断,而后直到民国时期,因各种因缘际会,法相唯识学才隐隐有复兴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法相宗以诸法法相(万事万物)为分析对象,其分析方法与近代科学相似,正当今日科学时代之机。”而现代佛学家吴信如居士则说道:“在最近数十年,为中土一般学佛者所推重,几乎有同一的趋向,以为近乎物质文明、含着科学精神,足为现代唯一当机的教法的,这便是法相宗。”则是认为法相唯识学正是甚至是现代唯一当机的佛教宗派。

既然法相唯识学如此适合现代人的根性,而梵净山又称为弥勒菩萨的道场,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是否应该在梵净山建立法相唯识学的研究机构,研究宣扬法相唯识学。因为,如果梵净山能够称为法相唯识学研究的重镇甚至拥有最高等学术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梵净山最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弥勒菩萨传下的法相唯识学。能够最好地传承弥勒菩萨的学问的地方,不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又是什么呢?

具体来说,一者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法相唯识学研究所,礼聘海内外精研唯识的学者来此主持,如济群法师;二者可以定期举办国际唯识学研讨大会,邀请海内外唯识学者都到梵净山来宣讲法相唯识学;三者可以出版发行法相唯识学研究的刊物,定期宣传梵净山的佛教文化。不要以为这个与一般大众无关或者与梵净山的历史传统不紧密就觉得不能实行,或者实行的意义不大,我们在前面就论证过:文化是可以创造的。如果我们能创立梵净山法相唯识学传统,那么在学术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岂非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样,日后研究中国文化,则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提及梵净山,这样,梵净山又岂不是有了深厚的历史底蕴?须知佛光山五十年前,也不过是一个荒山野岭。

事实上,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已经提出类似的建议了。如龙新明先生在我区社科界“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理论研讨座谈会上提出:“建议将铜仁文化研究列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设立专项资金,确保研究活动正常开展;……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研究水平。”

上述建议是针对高层次文化的,是为梵净山在中国文化史上谋一席之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一般大众的需要。为此,我们可以在弥勒净土上下功夫。据佛经记载,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内院说法,此即弥勒净土。在中外佛教史上,有许多高僧曾经上升到弥勒净土,如无著菩萨和虚云老和尚都曾经亲自听弥勒菩萨说法;也有很多高僧发愿往生弥勒净土,如玄奘、太虚大师。

虽然现在汉传佛教信众一般都是希望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往生西方要求比较高,如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临终的时候才比较有把握。但如星云大师所说:“兜率内院,是在欲界中的一个兜率天里。离我们这个世界不远,要往生到弥勒净土,不必像求生其他的净土,要具备非常艰苦的修行,才能往生。往生兜率净土只要我们皈依三宝,清净持戒,如法布施,发愿往生即可。弥勒菩萨的慈悲与善巧方便,使这个世界的众生容易得度。”

既然往生弥勒净土有历史上的高僧大德为先导,相对来说又比较容易,那么我们在发展梵净山佛教禅宗法统的同时,在新修的寺庙里,也可以礼请修弥勒净土的比丘住持,在日常修行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平时也可以向游客宣传弥勒净土的信仰,假以时日,影响必日见深广,渐成与四大名山齐名的弥勒道场。

如此二者结合,在僧俗二众,亦不论学术研究还是普通信仰,都会摄受相当的众生,而梵净山弥勒道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若复有人寻根究底,追问弥勒菩萨的道场到底在哪里?则我们可以用圣严法师在回答观世音菩萨的道场究竟在印度、还是在中国普陀、还是在西藏拉萨这一问题的方式来回答这一疑问。

圣严法师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追问,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也因时机因缘的不同,而会在许多的地方出现。”

同样的道理,弥勒菩萨虽然在兜率天宫,曾到印度传授《瑜伽师地论》,曾经在浙江奉化示现,可以到铜仁梵净山来教化众生!

曾经主持常德诗墙修建的杨万柱先生在回忆诗墙建设的文章《一墙天地人——中国常德诗墙成因探析》中说道:“建设中国常德诗墙的决策过程很简单。1990年,常德市委市政府决定整治城区沅江防洪大堤。1991年4月,政协委员伍顺生提出建议,结合防洪大堤整治工程修建‘常德诗墙’。随即,市长蔡长松批示‘同意,很有意义’。9月,市委、市政府正式决定修建‘中国常德诗墙’,并成立了以市长任主任的诗墙修建委员会。一项历时10年的宏伟文化建设工程,从建议到启动,仅用了5个月时间。”而后他又在文章中说:“长达三千米的宏伟工程耗资不到五百万”。

从诗墙建设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文化建设,关键就在领导者是否有见识、有魄力、有耐心。领导者是否能认识到“文化,只有文化才是城市的灵魂;在城市建设中反映和体现地方文化,正是城市特色之精髓。”城市如此,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建设,也同样如此;而一个有魄力的领导集体,就能将这样的见识迅速付诸行动,常德诗墙之建设,“从建议到启动,仅用了5个月时间”;当然,还需要领导者有耐心有远见,能够等待十年二十年才能出成果;对于梵净山特色佛教文化建设来说,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的文化建设,事实上也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它的回报则远远超出它的投资,如诗墙,它带给常德的,又岂只是五百万?并且,这样的文化成果,是一笔有形更是有形的资产,可以存诸后世,流诸久远。古人有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信哉斯言!

责任编辑:任敬廷